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探討相關文獻，回答第一章第二節陳述之各研究問題。藉由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與推論，研究者同時逐步提出「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CSAAM)，以及整體驗證 CSAAM 的相關文獻。具體而言，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針對研究問題一，介紹「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影響」之相關文獻；第二節則針對研究問題二、三，陳述的是「立場對立對贊否反應直接影響」之相關文獻；第三節則針對研究問題四，探討「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對論點贊否反應同時影響」之相關文獻，並提出「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CSAAM)。第四節則針對研究問題五、六、七，介紹整體驗證「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CSAAM)的相關文獻。

第一節 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之影響

在過去有關溝通、說服的研究或專書中，大多指出「論點性質」是會對說服效果產生影響的(例如 Aronson, Wilson, & Akert, 1994; Petty & Cacioppo, 1990; Taylor et al., 1997; Wood, Kallgren, & Preisler, 1985)。換句話說，至少在某些情況中，「論點性質」會是影響說服效果的關鍵因素。然而，過去這些相關研究中，通常比較關心的是「態度或行為改變」等說服效果，在本研究中比較關心的則是「論點性質」是否會對接收者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也就是說，本研究想瞭解的是：當傳送者提出什麼性質的論點時，可能會引發接收者對論點的贊成傾向？又什麼性質的論點可能會引發接收者的反對傾向？這正是本研究關心的第一個問題。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認為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等兩類論點性質，可能是影響接收者論點贊否反應的重要因素，以下依序介紹相關文獻與推論。

一、 論點立場 (argument position) 相關研究

(一) 論點立場的定義與分類

在日常生活中，有關意見討論或說服的議題，常常都是有著相反立場的議

題，而每種立場也往往會有一些支持該立場的論點。例如我們在針對體罰這個議題與人進行討論時，支持體罰或不支持體罰就是相反的立場，而支持或不支持體罰，也都各會有一些支持該立場的論點；又例如當售貨員在說服顧客買產品時，應該買或不應該買也是相反的立場，而該買或不該買，也都各會有支持該立場的論點。換句話說，論點立場一詞是一個較中性的名詞，指的是「在某個議題上，特定論點所支持的立場」。

事實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針對特定的議題在與別人進行意見討論、在說服別人、或甚至被別人說服時，也都常常持著特定的立場，而所接觸到的論點也常常可能是正反並陳的雙邊訊息 (two-sided messages) (Aronson et al., 1994; Gass & Seiter, 1999; O'Keefe, 2003; Perloff, 2003; Simons, et al., 2001; 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因此若從個體 (接收者) 對特定議題自身立場的角度來看，個體所接觸的論點可能可以區分為兩類，一類是支持個體自身立場 (與個體自身立場一致) 的論點，另一類則是不支持個體自身立場 (與個體自身立場不一致) 的論點。在本研究的界定中，則參考 Petty 與 Cacioppo (1979b) 的用語，將支持個體自身立場的論點稱為順論點 (propositional arguments)，不支持個體自身立場的論點稱之為逆論點 (counterpositional arguments)。

(二) 論點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之影響

如以上所述，在日常生活中，個體在針對特定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常常都會持著特定的立場，因此也常常可能會接收到一些順論點或逆論點，甚至在說服別人時，也可能經過一些客觀的分析，同時傳遞出一些順論點或逆論點 (例如 Hovland, Lumsdaine, & Sheffield, 1949)。那麼個體在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論點立場是否會對個體表現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呢？

針對這個問題，Petty 與 Cacioppo (1979b, 1996) 指出，順論點會讓受試者產生較多贊同的想法，逆論點則會讓受試者產生較多的反駁，而當受試者對此議題的涉入程度越高時，順論點的說服效果將越強，逆論點的說服效果將越弱。由

這樣的說明顯然可以推論，當個體在對所接觸的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應該較會對順論點做出贊成的判斷，而較會對逆論點做出反對的判斷。另外，Carter 與 Simpson (1970) 亦曾經依序呈現給受試者一些順論點、逆論點或中性的論點，並要求受試者以按鍵方式將當下呈現之論點暫停 (stop) 在螢幕上，以表達同意或不同意該論點之論述，再紀錄受試者分別在各類論點同意或不同意之個數來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中性論點情況下，受試者同意或不同意該類論點的個數並無差異；在順論點情況下，受試者同意該類論點的個數比不同意該類論點的個數多；在逆論點情況下，受試者不同意該類論點的個數比同意該類論點的個數多。換句話說，由以上的研究可以推論，由於順論點即是和個體自身立場一致的論點，而逆論點即是和個體自身立場不一致的論點，因此順論點應該較會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 (活化個體對其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並抑制個體對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而逆論點則應該較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 (抑制個體對其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並活化個體對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

二、 論點品質 (argument quality) 相關研究

(一) 論點品質的定義與分類

在近來許多有關溝通、說服的專書或研究，在說明或探討關心的說服效果時，大多會納入論點品質這個變項(例如陳友琦與孫蓓如,民 88; Petty & Cacioppo, 1979b, 1986, 1990, 1996)，然而不同研究者對論點品質的定義角度卻略有差異，例如 Wood 等人 (1985) 主要由論點是否有事實證據的角度來界定論點品質，而有些人則是由論點內容是否有說服力的角度，對論點品質進行界定 (Petty & Cacioppo, 1986)。

然而，不管是由什麼角度來界定論點品質，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多半會依據所界定的論點品質來將論點區分為強論點與弱論點兩大類。例如由於 Wood 等人 (1985) 主要是由論點是否有事實證據支持來定義強、弱論點，因此強論點

指的是有事實證據支持的論點，例如論點的來源是可信的期刊；而弱論點則為較沒有事實證據支持的論點，例如論點的來源是朋友的父親等非專業人士。而 Petty 與 Cacioppo (1986, 1996) 則主要由接收者較主觀的角度來對論點作區分，亦即依據論點在受試者眼中是否有說服力，將論點區分為強論點 (strong arguments) 與弱論點 (weak arguments) 兩類，而他們認為強論點會讓受試者對其產生贊同的想法 (favorable thoughts)，弱論點則會引發受試者對其產生反駁 (counterarguments)。Zuwerink 與 Devine (1996) 則是由經過深思後論點的價值性 (worthy) 以及論點難以反駁程度的角度切入，因此強論點是比較重要、有價值，且難以反駁的論點，而弱論點則反之。另外，陳友琦與孫蓓如 (民 88) 則是同時由論點的說服力和有道理程度，來進行強、弱論點的區分。

由以上探討的文獻可知，不同研究者在界定「論點品質」以及區分「強、弱論點」時，切入的角度並不完全相同。有些主要是從受試者主觀判斷有無說服力的角度來進行界定與區分，並不完全強調論點客觀的邏輯性、重要性或真實性 (例如 Petty & Cacioppo, 1986)，有些則較強調論點客觀的邏輯性、重要性或事實證明等 (Wood et al., 1985; Zuwerink & Devine, 1996)，又有些則同時由論點的說服力與有道理程度進行界定與區分 (例如陳友琦與孫蓓如，民 88)。而綜合以上各家看法，可知在過去研究的界定中，一個對接收者有說服力的論點，可能是因為兩種原因：一種是就客觀上來講，該論點陳述的內容較有道理；另一種則是就主觀上來講，該論點可以引起接收者的贊同 (論點內容未必有道理)。而由於本研究隱含的目的之一是希望瞭解個體在意見討論過程中，能否對所接收的論點進行客觀理性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對論點品質的界定較強調的是論點內容的客觀說服力程度。故本研究將論點品質界定為「論點所呈現內容是否有道理、有說服力的程度」，並依此定義將論點品質區分為「強論點」與「弱論點」兩類，其中強論點屬較有道理、有說服力的論點 (在道理上較有說服力)，亦即「論點內容邏輯關係清楚、且重要」的論點；而弱論點是較沒有道理、沒有說服力的論點 (在道理上較沒有說服力)，亦即「論點內容邏輯關係較不清楚、或不重要」的論點。

(二) 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之影響

在過去有關說服效果的研究中，普遍發現強論點的說服效果高於弱論點 (Petty & Cacioppo, 1986)，而弱論點則會比強論點引發較大的抗拒 (Zuwerink & Devine, 1996)。然而事實上，雖然強論點有時會比弱論點讓人產生更多的態度改變，但是有時卻未必如此 (Taylor et al., 1997)，例如 Petty 與 Cacioppo (1979b, 1990) 發現議題的涉入 (issue involvement) 和論點品質的說服效果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當議題對受試者切身相關或有較高的重要性時，那麼強論點會比弱論點有較高說服效果；然而當議題對受試者而言較不切身相關或重要性較低時，那麼強、弱論點的差異就沒那麼明顯了。顯然的，論點品質對說服效果的影響可能並不直接，而需考慮到受試者對議題涉入程度等其他因素。

何以會產生這樣的情況呢？Petty 與 Cacioppo (1986, 1996) 的推敲可能性模式 (ELM) 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 ELM 中，認為人們在接收到溝通訊息時，有可能以較深思熟慮方式，或是以較自動化的方式來思考訊息。當個體有動機和能力時，會傾向走中央路徑，進行比較深思熟慮的思考，所以此時態度改變主要決定於論點的品質；當個體沒有動機或能力時，個體則會傾向走周邊路徑，進行較自動化的思考，所以此時態度改變比較可能決定於周邊的線索，例如訊息來源是否是專家等。換句話說，由 ELM 來看，產生先前研究結果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當議題對受試者而言較切身相關，或是有較高的重要性時，受試者會比較有動機進行深思熟慮的思考，而且因為先前研究中的受試者在參與實驗時，通常也有思考的能力，因此受試者會傾向走中央路徑，關心的是論點的內容與品質，也因此強論點的說服效果會高於弱論點；反之，當議題對受試者而言較不切身相關或重要性較低時，受試者會比較沒有動機進行深思熟慮的思考，因此會傾向走周邊路徑，此時較容易被周邊線索影響，而不考慮論點的內容與品質，也因此強論點與弱論點的說服效果較無差異。而這樣的觀點也與 Chaiken (1980)、Chaiken 與 Maheswaran (1994) 的看法類似，當個體有動機與能力時，會傾向進行系統式

處理，而此時態度改變與否比較決定於論點的審視與思考；反之，當個體沒有動機或能力時，會傾向進行捷思式處理，態度改變與否則較決定於一些簡單決策規則的使用，例如專家是可信任的、大多數人的意見是正確的、或論點越長越正確。

綜合以上的相關研究，可知至少在個體有動機以及有能力的情況下，論點品質會對態度改變等說服效果產生影響，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中，強論點會比弱論點更有說服效果。那麼值得探討的是，在日常生活的意見討論情況中，如果受試者也有動機、能力思考論點的內容時，強、弱論點分別會對個體的贊否反應產生什麼影響呢？針對這個問題，雖然在先前探討的文獻中，並未明確做出這樣的說明，但由於在本研究的界定中，強論點即屬於較有道理、有說服力的論點，而弱論點則屬於較沒有道理、沒有說服力的論點，且先前介紹的許多研究中亦明確提及強論點會比弱論點更有說服效果（例如 Wood et al., 1985; Zuwerink & Devine, 1996），Zuwerink 與 Devine 更明確指出不重要且較容易反駁的弱論點，可能會較強論點引發較多的負向情緒。因此綜合以上的說明，可以推論至少在個體有動機以及有能力的情況下，強論點應該較會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活化個體對其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並抑制反對判斷的反應），而弱論點則應該較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抑制個體對其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並活化反對判斷的反應）。

三、 區分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原因

在上述有關 Petty 與 Cacioppo (1986, 1996) ELM 的說明中，提及當個體走中央路徑時，態度的改變主要決定於論點的品質。換句話說，在 ELM 中，明確的提及了論點品質在說服歷程扮演的角色。那麼論點立場呢？

事實上，在 ELM 對論點品質的界定中，應該是包含論點立場的。由前述 Petty 與 Cacioppo (1986) 的說明中，可知 ELM 主要是由受試者主觀角度來界定論點品質，強論點指的是一個有說服力的論點，會讓受試者對其產生贊同的想法，而不必然是客觀事實；弱論點則指的是沒有說服力的論點，會讓受試者對其產生反駁，也不必然是客觀事實。此外，在先前所介紹 Petty 與 Cacioppo (1979b,

1996)對論點立場的說明中,更明確提及順論點是會讓受試者產生較多贊同想法的論點,而逆論點則是會讓受試者產出較多反駁的論點,且順論點的說服力也較強於逆論點。換句話說,在 ELM 對論點品質所做的界定中,似乎並沒有將論點立場排除在外,論點品質應該會是包含論點立場的。

那麼何以要對論點品質與論點立場二概念進行區分呢?針對這個問題,本研究認為因為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說服效果或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可能會彼此矛盾,所以論點品質與論點立場是有差異而值得區分的概念。換句話說,一個有道理、能促進說服效果或會引發贊成傾向的強論點,也可能同時是減弱說服效果或引發反對傾向的逆論點;而一個沒有道理、不利於說服效果或會引發反對傾向的弱論點,卻可能同時是能加強說服效果或會引發贊成傾向的順論點。因此,本研究在探討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時,將此二概念作一區分,並同時考慮,希望能提供更周延的解釋。

四、 論點品質與論點立場的影響皆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相關研究中,普遍將論點品質的影響,視為意識層面的處理(例如 ELM 的中央路徑),但較少有研究明確提及論點立場的影響是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針對這個問題,由於 ELM 並未明確區分論點品質與論點立場的概念,且在先前的文獻中提及個體對於論點的審視,應皆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Petty & Cacioppo, 1986),因此由這樣的角度可以推論,除了論點品質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之外,論點立場的影響亦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

五、 本節小結

本節整理與推論之概念,可歸納於圖 2-1-1(圖中黑線部分所示,淺灰線部分為後續各節所欲推論之概念)。由圖 2-1-1 可知,本研究認為至少在個體有動機與能力思考時,論點立場和論點品質等兩類論點性質,皆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其中順論點或是強論點皆會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而使個體做出

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線段尾端以箭頭表示），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線段尾端以圓形表示），也因而會使個體顯現出「更容易贊成」，且「更不容易反對」之贊否反應結果；然而逆論點或是弱論點則皆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使個體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也因而會使個體顯現出「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之贊否反應結果。而這兩方面有關論點性質的影響，皆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以實線表示）。針對本部分推論（研究問題一），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一的设计與執行來進行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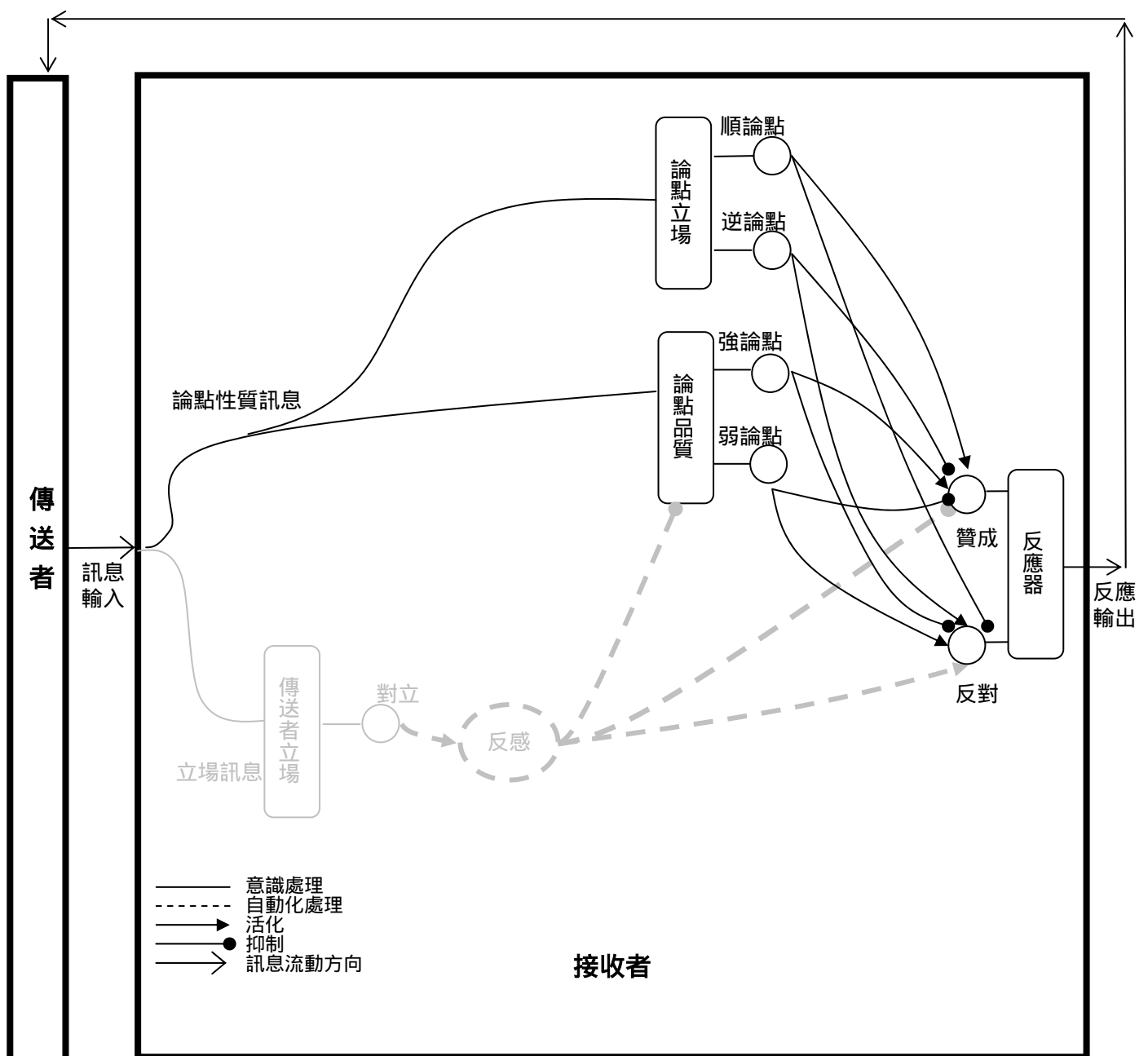


圖 2-1-1 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之影響

第二節 立場對立對贊否反應之直接影響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二與問題三是希望瞭解在立場對立情境中，傳送者的立場對立訊息，是否會對接收者的贊否反應產生影響？立場對立訊息是否會引發接收者對傳送者產生反對傾向？又如果立場對立訊息會引發接收者的反對傾向，那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接收者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是否屬於一種自動化的處理？以下依序介紹相關文獻與推論：

一、 立場對立訊息會引發接收者對傳送者產生反對傾向

過去有關溝通與說服的研究雖然多少涉及立場相反的說服情況，但這類研究的主要焦點大多擺在探討「如何在真實世界情境中，嘗試改變接收者的態度與行為」(Burgoon et al., 2002; Hass, 1981)，較少有研究直接針對立場對立情境的意見討論過程，探討接收者對傳送者之贊否反應傾向。那麼令人好奇的是，在這種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情境中，接收者會對傳送者產生什麼樣的贊否反應傾向？接收者會對傳送者產生反對傾向嗎？這是本研究想瞭解第二個問題。以下先介紹各相關研究結果及概念，最後再歸納出本研究對此問題之推論：

(一) 立場對立可能導致接收者經由心理反感而引發反對傾向

Brehm (1966; Brehm & Brehm, 1981) 在其所提出之心理反感論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中指出，人為了滿足生存的需求，會企圖維持自己行動或態度各方面的自由，一旦自由受到威脅，便會產生心理的反感，並促使個體採取一些方式來回復自由，例如貶損訊息來源，而當個體面對的自由威脅越強時，所激起的抗拒反應會越強。

依據這樣的論點，可知任何反對個體當前態度和行為的人或訊息，事實上皆可能被個體知覺為對自由的威脅，因而對其產生心理的反感，並引發個體產生忽略說服訴求或貶損訊息來源等反對的傾向與反應 (Burgoon et al., 2002)。由此

觀之，可推論當個體在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情境中時，亦可能因立場對立者反對自己的立場，而感受到自由受威脅，因而對其產生心理反感。同時，個體為了想要回復自由，可能會對立場對立者產生反對的傾向與反應。

（二）預警（forewarning）相關研究

在過去說服的研究中，有一研究脈絡在探討預警對說服效果的影響。而 Papageorgis (1968) 及 O'Keefe (2003) 指出有關預警的研究中，可以區分為「訊息立場預警」與「說服意圖預警」兩類，其中訊息立場預警的研究在探討「當預先告知接收者即將面對的訊息是與其立場不一致的訊息時，會對說服效果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而說服意圖預警的研究則在探討「若警告接收者訊息傳送者的說服意圖時，會對說服效果產生什麼影響」(Taylor et al., 1997)，以下分別說明此兩部分研究，以及其與本研究關連：

1. 訊息立場的預警 (forewarning of message position)

在這方面的研究結果中，大多發現倘若接收者預先知道即將面對的訊息是與其立場不一致的訊息時，會產生抗拒說服的效果 (Knowles & Linn, 2003b; O'Keefe, 2003)，亦即接收者之態度改變量將會變小。例如 McGuire 與 Papageorgis (1962) 指出，當對聽眾進行預警，告知其即將面對的訊息和其立場有差距 (discrepancy) 時，會刺激其產生一些支持自身立場與反對另外立場的論點 (引起較多反駁)，因而對之後接觸的訊息產生抗拒說服的情形。Freedman 與 Sears (1965) 的研究也發現，當青少年在接觸立場不一致訊息一段時間前 (例如 10 分鐘前)，被告知將面對與自己立場不一致的訊息時，則這些青少年的態度較不會因這些立場不一致訊息之說服而產生改變，而且越提早告知，引起的反駁越強。另外，Allyn 與 Festinger (1961) 及 Haas 與 Grady (1975) 的研究也都顯示出相似的結果。雖然在一些研究中發現，當預先告知受試者即將面對的訊息是立場不一致的訊息時，反而會使受試者更容易被立場不一致訊息說服 (例如 Apsler & Sears, 1968)，但這主要可能是因為受試者對議題並沒有高度涉入所導致，Chen

等人 (1992) 的研究即明確指出，當個體對一個議題高度涉入，而且又被告知將接觸與自己立場有差距的溝通訊息時，個體將更能夠去抗拒說服。顯然的，依據上面整理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至少個體在面對一些對自己切身相關或重要等高度涉入的議題時，若預先知道即將面對的是立場不一致的訊息，將有助其抗拒說服訊息，態度也較不易被說服改變 (Gass & Seiter, 1999; O'Keefe, 2003; Petty & Cacioppo, 1977; Taylor et al., 1997)。

2. 說服意圖的預警 (forewarning of persuasive intent)

O'Keefe (2003)、Levine (2003)、Smith 與 Mackie (2000) 指出說服意圖的預警會讓受試者在面對說服訊息時預先準備，產生較大的反駁，因而減低對接收者說服的效果。Taylor 等人 (1997) 亦認為，當個體預先知道他人想要說服改變自己，而該議題又和自己切身相關與重要時，個體將較能抗拒態度的改變。事實上，這樣的論點在很多研究或學者的觀點中都可以得到支持，例如 Petty 與 Cacioppo (1979a) 的研究正發現了這樣的結果，他們發現當大學生被告知訊息傳送者的說服意圖，而且該議題和自己切身相關時，那麼他們的態度將較不會產生改變。McGrane、Toth 與 Alley (1990) 也發現當受試者知覺到說服意圖時，會造成較少的訊息接受量，相反的，若將意圖以較不明顯的方式隱藏起來，受試者將會比較容易受到影響 (Weinstein, Grubb, & Vautier, 1986)。顯然的，依據上面整理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至少個體在面對一些切身相關或重要的議題時，若傳送者讓其說服意圖清楚的顯現出來，那麼接收者會產生較大的抗拒說服傾向。

3. 由心理反感論解釋預警對於抗拒說服效果的影響

綜合以上有關預警的兩方面研究，可知就切身相關或重要的議題而言，不管是訊息立場，或是說服意圖的預警，都可能導致接收者產生較大的抗拒說服傾向，而這樣的結果亦可由 Brehm (1966; Brehm & Brehm, 1981) 提出之心理反感論獲得適當的解釋。

在心理反感論中提及，當個體面對的自由威脅越強時，所激起的抗拒反應會越強，而影響自由威脅強弱的因素，依據 Burgoon 等人 (2002)、Knowles 與

Linn (2003b) 的整理，除了包括知覺該自由行為的重要性 (importance)、自由行為受威脅的比例 (proportion)、威脅刺激的大小 (magnitude) 外，意圖亦是一個重要因素。當在鼓吹一個立場時，使用「讓威脅外顯的訊息」，例如明確告知接收者待會要接觸的訊息是與其立場不一致的訊息 (亦即訊息立場預警)，或是傳送者想要說服接收者 (亦即說服意圖預警)，都可能讓接收者感受到較明顯的說服意圖與較大的自由威脅，因此會比「隱藏威脅的訊息」引起較大的反感反應。Knowles 與 Linn (2003b) 即由反感論觀點清楚的指出，直接的要求會比間接、小心處理過的要求引起更多的心理反感，因此可能進一步引發較大的抗拒說服效果。而這種由心理反感論角度，解釋預警引發抗拒說服的效果的看法，亦和 Fukada (1986)、Gass 與 Seiter (1999) 的研究成果或看法一致。

4. 以上預警相關研究、解釋與本研究之關連

綜上所述，可知就切身相關或重要議題而言，如果當接收者知道所將接觸的訊息是與自身立場不一致的訊息，或是感受到傳送者想要說服自己時，都可能因產生心理反感，而導致較大的抗拒說服傾向。雖然本研究關心的是「個體對立場對立者可能產生的贊否反應傾向」，其中並未直接涉及「說服意圖或是訊息立場的預警」，也非關心「態度改變」的說服議題。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當個體在針對切身相關或重要議題，與一個反對自己立場的人進行討論時，通常也意味著「此人所傳遞的將是與自身立場不一致的訊息」(即使此人呈現的訊息亦可能是正反並陳的雙邊訊息)，且「此人想要說服改變自己」。因此，依據這一系列研究與以上觀點亦可推論，當個體在切身相關或重要議題上，和一個反對自己立場的人 (立場對立者) 進行討論時，亦可能經由心理反感，而對其產生反對傾向。

(三) 自我價值 (self-worth) 相關研究

Covington (1983, 1984) 在其提出的自我價值論中指出，每一個人都想要被視為是一個有能力、有價值的人，而這種必須覺得自己很好以及維持自尊的需求，在很多研究中都已經被證實會影響到「人對自己和他人產生的許多認知、情

緒與行為反應」(Dunning, Leuenberger, & Sherman, 1995; Fein & Spencer, 1997; Kunda, 1999; Pennington, 2000)。然而，倘若個體這方面的需求遭受到他人的威脅、打擊或是挫折時，個體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反應傾向呢？依據人際吸引之自尊論 (self-esteem theory)，Jones (1973) 指出人會傾向被那些給我們正向評價，提升我們自尊的人所吸引，而會不喜歡那些貶損我們的人。甚至依據挫折攻擊假說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進行推論，這種挫折亦可能會讓人產生憤怒等負向的情緒，而使個體對他人的攻擊傾向增加 (Taylor et al., 1997)。換句話說，這種對自我價值的威脅、打擊或是挫折，可能會引發個體對威脅者產生負向的評價、情緒與行為傾向。

因此，在以上一系列的相關文獻中，雖然並未直接說明個體在立場對立情境中可能存在的反應傾向，但個體對立場對立者之反應傾向，似乎亦可由此角度做一推論。簡而言之，依據這樣的觀點，可知當個體在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若他人反對個體自身的立場，那麼個體亦可能會因為對方不認同自己、認為自己不正確，而感受到自我價值遭受威脅、打擊或挫折，因此導致個體對其產生反感的情緒，並引發出反對的傾向。而這樣的推論，亦可由 Reeder 等人 (2005) 以及 Turner、Hogg、Oakes、Reicher 與 Wetherell (1987) 的看法中得到支持，亦即個體有時會因為想勝過他人 (滿足自我價值需求)，而導致產生「想辯護或防衛自己的態度，或反對立場對立者」的反應。

(四) 自我中心動機歸因 (ego-centric motive attribution)

Reeder 等人 (2005) 關心的議題與本研究相當類似，亦即聚焦於立場有差距的情境，探討個體面對態度立場 (attitude position) 相反者，可能產生的一些傾向，但其研究主要想瞭解的是「個體會如何知覺態度立場相反者之動機」。

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受試者會傾向將「立場相反者」之動機歸因為負向的，尤其在個人高度涉入的態度議題上更傾向有此偏誤。例如不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美國與加拿大大學生，和支持出兵的人相較起來，較傾向把美國總統布希

出兵的動機歸因為自私的，此偏誤稱為「自我中心動機歸因」(ego-centric motive attribution)。他們更明白的指出，人們會依據主觀的觀點、界定和需求來主動建構對現實 (reality) 的知覺，因此個體自己的態度立場，會影響個體對立場與自己相同或相反者動機之歸因，導致自己對立場相反者的動機產生偏誤判斷。

雖然在此研究中驗證的主要是「偏誤的動機歸因傾向」，然而由此研究至少可以推論出一個現象，亦即當個體有一特定立場時，那麼面對立場相反者的相關判斷似乎很難作客觀理性的分析，而可能較傾向將對方的動機歸因為負向的、自私的。因此，若由這種觀點進行推論，可知當個體面對一個反對自己立場的人(立場對立者)時，亦可能會因為對其動機產生較負向的歸因，而對其產生心理反感，並進一步引發出反對的傾向。

(五) 素樸實在論 (naïve realism)

Ross 與 Ward (1996) 指出，成人在日常生活中會顯現出素樸實在論 (naïve realism)。此傾向是自小自我中心主義的遺跡，主要包含三種相關信念：首先，會相信自己是客觀的；其次，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對事情的看法將和自己一樣；最後，相信別人看法之所以和自己不同，是因為其缺乏資訊、懶惰、不理性或因為一些原因 (例如意識型態或自我利益) 而導致偏誤。如果人們發現相關訊息是容易接觸到的 (例如媒體頻繁報導)，人們將對一些反對自己意見者採取較強硬立場，認為其被蒙蔽了，而自己沒有。顯然的，由 Ross 與 Ward (1996) 的觀點可推論，當個體面對一個立場和自己對立的人時，可能會因為對其抱持著一些較負面的看法，而對其產生心理反感，並進一步引發出反對的傾向。

(六) 自我分類理論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另外，Kenworthy 與 Miller (2002) 亦提及態度之相似性有時會被當成團體的界限 (boundary)，個體會將那些態度與自己相同者一起知覺為「有凝聚力而一致的團體」。而依據自我分類理論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的觀點，個體在某些向度尋求或分類內團體與外團體後，將傾向認為和自己態度立場相似者 (內

團體), 會較態度立場相反者(外團體)對世界有較真實的知覺(Reeder et al., 2005; Turner et al., 1987), 而且內團體較感興趣的是打敗外團體, 而不是盡量為自己的團體獲得更多利益 (Taylor et al., 1997)。除此之外, 自我分類理論中亦有提及, 個體有時會努力讓自己獨特 個人的身份(personal identity)能夠勝過他人(Turner et al., 1987), 這種在個人層次的努力亦可能導致個體去辯護或防衛他們的態度, 尤其是在面對持有相反信念的其他人時 (Reeder et al., 2005)。顯然的, 由以上的觀點亦可推論, 當個體面對一個反對自己立場的人 (立場對立者) 時, 可能會將其視為外團體、想勝過他, 而對其產生心理反感, 並進一步引發出反對的傾向。

(七) 平衡論 (balance theory)

最後, 在 Heider (1958) 提出的平衡論中, 指出「個體對態度對象的評價」, 必須與「個體對另一人的評價」以及「另一人對態度對象的評價」維持平衡的關係。換句話說, 由於人希望有和諧、簡單、連貫與有意義的社會關係知覺, 因此會驅使個體、另一人以及態度對象間的評價關係, 呈現平衡的狀態 (Taylor et al., 1997)。雖然在此理論中, 並未說明個體在立場對立情境可能存在的傾向, 但個體對立場對立者之傾向, 似乎亦可由此理論做一適當的推論。

首先, 個體針對特定議題與他人進行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時, 會對此議題表達出特定態度立場, 而個體對其支持之立場應維持正向評價的關係。然而, 立場對立者反對個體對此議題的立場, 因此立場對立者對個體支持的立場應維持負向評價的關係。倘若如此, 依據 Heider 平衡論, 個體應會對立場對立者產生負向的評價, 才能維持平衡的狀態。因此, 個體似乎會傾向於較不喜歡或是反對一個立場對立的人 (Taylor et al., 1997)。簡而言之, 依據這樣的觀點進行推論, 可知當個體面對一個立場和自己對立的人時, 個體可能會因為維持平衡狀態的需求, 而對其產生反感 (不喜歡), 並進一步引發出反對的傾向。

(八) 小結

綜合以上有關心理反感論、預警相關研究、自我中心動機歸因、素樸實在

論、自我分類理論、平衡論等相關研究與理論的看法，可以推論當個體面對立場對立者時，可能會因「感受到自由受威脅」、「對方威脅到自我價值」、「認為對方有自私動機」、「認為對方因缺乏資訊、懶惰、不理性或因為一些原因而導致偏誤」、「將對方視為外團體、想勝過他」、「維持平衡狀態的需求」等因素，而對其產生不喜歡、不欣賞等反感的情緒反應，以及想要加以反對的傾向。而這樣的觀念，可歸納於圖 2-2-1（圖中黑線部分所示，淺灰線部分為上一節與後續各節欲推論之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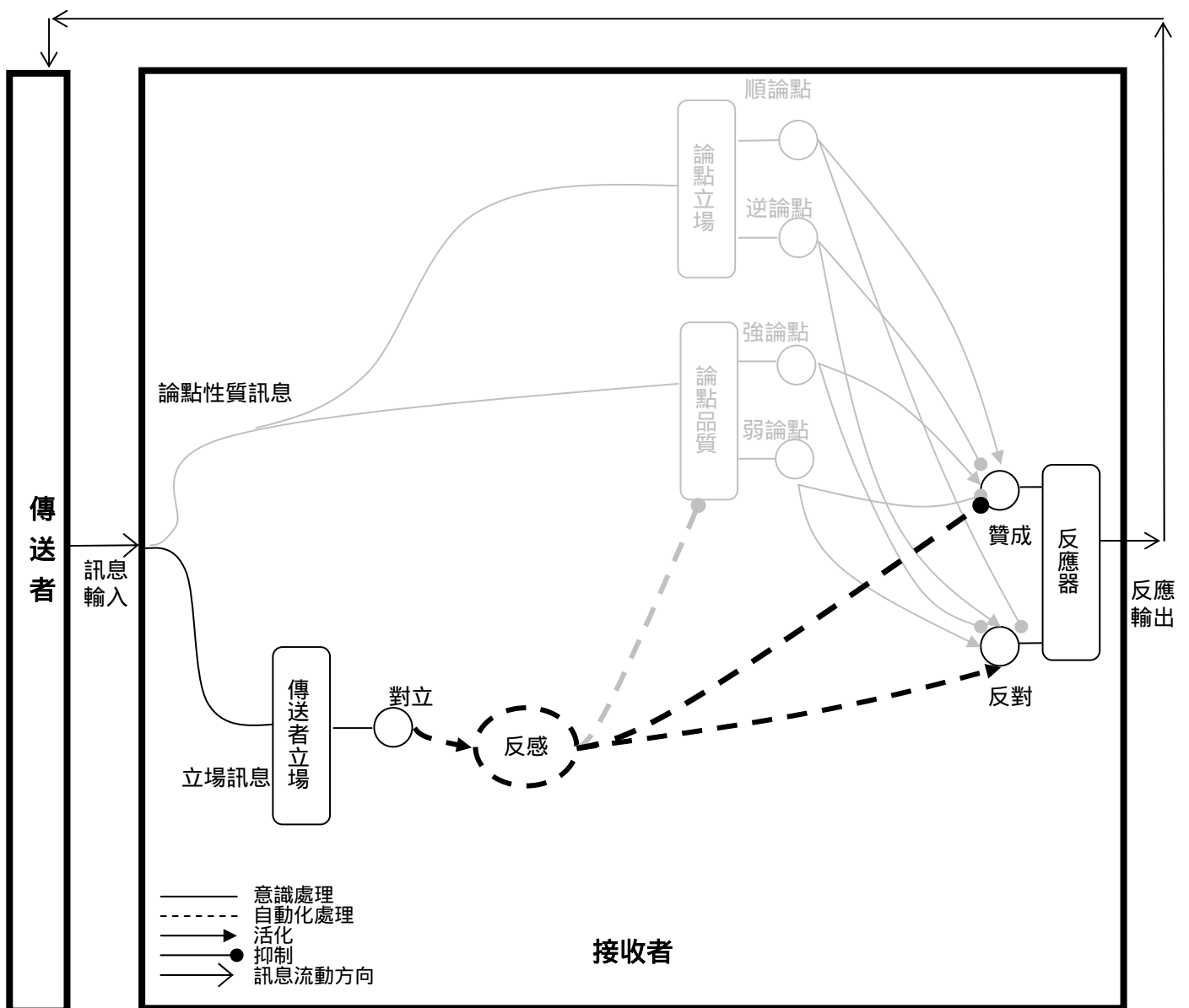


圖 2-2-1 立場對立對贊否反應的影響

由圖 2-2-1 中可知，本研究認為立場對立訊息會經由反感情緒，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這種反對傾向，將直接導致個體在針對立場對立者所認同或所屬的人、事、物與觀念等進行贊否判斷時（例如論點或相片等），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而使個體直接顯現出「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之贊否反應結果。針對本部分的推論（研究問題二），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二的設計與執行進行驗證。（註：圖中之虛線代表此種歷程屬自動化處理，將於稍後進行有關此自動化歷程之推論）

二、 立場對立對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屬於自動化處理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三想進一步瞭解的是，如果傳送者的立場對立訊息會引發接收者的反對傾向，那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接收者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是否屬於一種自動化的處理？這個問題可由以下相關文獻導出待驗證的推論。

（一） 自動化處理之定義與特徵

在心理學的研究中，自動化處理與意識處理是一組相對的名詞，要瞭解自動化處理的概念，多數的研究或介紹會採用自動化處理（automatic processing）與意識處理（conscious processing）對照比較方式加以說明（例如 Ashcraft, 2002; Bless et al., 2004; Kunda, 1999），因此以下主要採對照方式說明自動化與意識處理之定義與特徵。

有關自動化處理的研究約始於 1970 年（Kunda, 1999），經過長時間的探討，其定義在過去研究中，並不完全一致，但簡單來說，其基本概念指的是能夠以自動化方式執行的知覺和認知處理，也就是那些在執行時幾乎不需要涉及意識控制或有限注意機制的處理，而意識處理則是需要涉及意識控制或有限注意機制的處理（Ashcraft, 2002; Bless et al., 2004）。然而要更深入瞭解自動化處理與意識處理的概念，一般可由自動化處理與意識處理（Posner & Snyder, 1975）或控制處理（controlled processing）（Shiffrin & Schneider, 1977）相對應的特徵加以界定。

依據 Posner 與 Snyder (1975) 有關自動化 (automaticity) 的觀點, 自動化處理和意識處理相較起來必須具備三個基本的特徵: 首先, 「自動化處理發生時並不需要意圖」。換句話說, 自動化處理是否發生和你要不要它發生並沒有關係; 其次, 「意識並無法覺知或省察到自動化的心理處理»; 第三, 「一個完全自動化的處理幾乎不耗費任何意識能源」。除了以上提及的三個特徵外, Ashcraft (2002) 指出自動化處理有另一個較不正式但卻非常有用的標準, 亦即自動化處理傾向於快速運作, 通常在一秒鐘內就已完成。另外, Kunda (1999) 整理 Shiffrin 與 Schneider (1977) 等有關自動化的相關文獻, 認為自動化處理指的是一些具備特定特徵的處理, 其特徵包括是在意識覺察外發生、執行時不需要意圖、一經啟動即無法控制、有高度效能 (efficiency; 亦即需要少量認知資源與時間), 而且可以和其他處理同時進行; 而意識處理則有一組相反的特徵, 包含執行需要意圖, 且有意識覺察、可以被控制和監控、執行需要心智的努力等。Bless 等人 (2004) 亦持著相同的看法, 認為自動化處理不需要意圖、幾乎不需要認知資源、無法也不需要意識控制、無法覺察; 而意識處理的特徵則正好相反。

綜合以上的看法, 可知判別屬於自動化或意識處理的標準可以歸納出五個特徵, 分別是發生時「需不需要意圖」、「可不可以覺察」、「啟動後可不可以控制」、「需少量或大量認知資源」、「運作時間快慢」等, 而若一個處理運作時不需要意圖、無法覺察、啟動後無法控制、只需少量認知資源、運作較快, 則較屬於自動化處理, 若反之則較屬於意識處理。

(二) 許多社會判斷的歷程包含自動化的處理歷程

有關「我們的判斷、情感和行為是自動化的, 而且受很多我們無法覺察、控制的 factors 影響」這樣的想法, 已經被現在研究者廣為接受 (Bless et al., 2004; Kunda, 1999; Pennington, 2000), 所以許多研究在針對其關注現象探討時, 都認同「社會相關判斷除了意識處理外, 亦包含自動化處理」的觀點, 因此會採取自動化處理與意識處理兼具的雙路徑觀點來釐清該現象, 並驗證自動化處理的存在。這一類研究中, 例如 Gilbert (1989) 所介紹有關對他人行為歸因的研究, 以及 Devine (1989) 有關刻板印象與偏見活化的研究, 分別說明如下:

1. 對他人行為的歸因歷程包含自動化處理

Gilbert、Pelham 與 Krull (1988) 在其研究中，發現個體在知覺或推論他人表現的特定行為原因時（歸因），會包含三個連續的處理：首先，會對行為的意義作歸類（categorization），亦即瞭解這個行動者做了什麼；其次，會對該行動者做性格描述（characterization），亦即這個行為意味什麼樣的特質；最後，考慮情境因素的影響力，對該性格描述做修正（correction），亦即瞭解什麼樣的情境因素導致該行動。舉例來說，當你無意間看見一個情境，情境中志明拿春嬌來開玩笑，結果春嬌突然抓狂，揍了志明，此時你首先可能會將揍人這樣的行為「歸類」為攻擊行為，接下來可能會對春嬌做「性格描述」，認為春嬌是個有攻擊傾向的人，但最後你可能會考慮情境因素做出「修正」，而認為春嬌是被志明激怒的，而且她剛剛才摔進水溝，所以才會生氣揍志明，或許春嬌並不是這麼有攻擊傾向的人。而依據 Gilbert 等人的看法，在這三個處理中，分類和性格描述是自動化的處理，修正則需要較多的認知要求，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Gilbert, Krull, & Pelham, 1988; Gilbert, Pelham, & Krull, 1988）。

而這樣的概念，也得到了許多研究的驗證。例如在 Gilbert、Pelham 與 Krull 等人 (1988) 其中一個實驗中，他們要求受試者聽某位學生閱讀一篇有關墮胎的文章，而那篇文章是該學生在被要求下而撰寫的（例如在被要求下，寫出支持或反對墮胎的文章）。一半受試者觀看的是支持墮胎的文章，一半受試者觀看的是反對墮胎的文章。結果發現在低認知負荷的情況中，受試者顯示出對應偏誤（correspondence bias）的傾向，亦即受試者較傾向將念支持墮胎文章學生的態度知覺為支持墮胎，而忽略了該篇文章是該學生在被要求下而撰寫的。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高認知負荷的情況中（研究者透過告知受試者在聽完後，也要寫文章並閱讀來製造認知負荷），這種對應偏誤的傾向卻顯著加強了。顯然的，高認知負荷沒有影響到自動化處理的運作，但卻讓受試者因為沒有足夠的認知資源來進行修正的意識處理，因而自動化處理的結果更直接的表現在外在反應上，導致對應偏誤傾向變強了。換句話說，在 Gilbert 等人的研究中，發現並驗證了對

應偏誤（或基本歸因謬誤）的產生，顯然是屬於自動化處理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也在許多採用不同方法操弄認知負荷的實驗中，獲得了重複驗證，例如要求受試者同時記住一長串的数字或字彙、監控或回應閃現在螢幕上的字彙、要求他們試著逗他人笑等等（Gilbert, 1989）。

2. 刻板印象及偏見之活化與應用包含自動化處理

此外，刻板印象與偏見的活化，也可能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Devine, 1989; Gilbert & Hixon, 1991）。在 Devine（1989）的研究中指出，人普遍有種族刻板印象與偏見存在，並且刻板印象與偏見的活化與應用是自動化的歷程。由於 Devine 認為在美國當時的文化中，人們如果在公開場合或問卷中表達刻板印象或偏見的想法與情感，可能會引起爭執，因此在自我的保護下，個人會加以壓抑（suppression），而不會輕易表現出來。也因此，在驗證刻板印象與偏見活化屬於自動化的處理時，Devine 採用了特殊的方法。首先，Devine 設計了有關種族刻板印象及偏見的問卷，並在正常狀況下詢問實驗受試者的意見，結果受試者的確沒有顯現出刻板印象及偏見的答案。然而接下來，當受試者在一邊回答同樣的問卷，同時進行另一項認知作業時（如背誦一篇文章），結果受試者就顯示出了明顯的種族刻板印象及偏見。顯然的，當受試者沒有足夠的認知資源來進行壓抑的控制處理時，自動化處理的結果就會更直接的表現在外在反應上，而導致刻板印象及偏見的溜出。這證實了刻板印象與偏見的活化的確屬於自動化的處理。

綜合以上的一些相關研究與論述，可知個體在進行一些社會判斷時，其認知歷程可能包含自動化處理的存在。換句話說，人在進行一些和社會訊息相關的判斷時，其判斷結果確實可能會受到一些自動化處理的干擾。

（三）立場對立訊息對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應屬於自動化處理

倘若立場對立訊息確實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導致個體在對立場對立者所認同或所屬的人、事、物與觀念等進行贊否判斷時，直接顯現出「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之贊否反應結果。那麼，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接收者

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是否如上面所整理的自動化相關研究一樣，亦是屬於一種自動化的處理呢？

針對這個問題，首先，依據先前整理的相關文獻，可知個體對立場對立者的反對傾向，主要是因個體「感受到自由受威脅」、「對方威脅到自我價值」、「認為對方有自私動機」、「認為對方因缺乏資訊、懶惰、不理性或因為一些原因而導致偏誤」、「將對方視為外團體、想勝過他」、「維持平衡狀態的需求」等因素，而使個體對立場對立者產生反感的情緒所導致(Brehm, 1966; Brehm & Brehm, 1981; Covington, 1983, 1984; Heider, 1958; Reeder et al., 2005; Ross & Ward, 1996; Taylor et al., 1997; Turner et al., 1987)。而這樣的看法也獲得一些其他學者的支持，例如 Burgoon 等人 (2002)、Knowles 與 Linn (2003b) 指出，個體的抗拒說服傾向，可能是源自於個體心理上反感的喚起。Zuwerink 與 Devine (1996) 也認為，抗拒說服的歷程，同時涉及了認知與情緒的處理。此外，Jack 與 O'Brien (2003) 亦指出，當對接收者進行肯定 (affirming) 後，似乎能夠減少其對說服的抗拒反應，而這樣的觀點顯示，個體對立場對立者存在的反對傾向應該和內在的動機或情緒有相當密切關係，甚至 Quinn 與 Wood (2003)、Wegener 等人 (2003) 更明確指出，個體辯護自己的態度、產生抗拒說服現象可能是因為內在的動機或情緒所導致。顯然的，個體對立場對立者產生的反對傾向，確實如本研究先前所歸納的，可能是經由反感情緒的中介所引發。

接下來，既然個體對立場對立者存在的反對傾向，的確可能是經由反感情緒的中介所引發，那麼依據過去一些學者的觀點，這種由情緒引發的傾向或反應，可能是未經認知仔細思考，而相當自動化的。例如 LeDoux (1996) 指出情緒反應有可能並不需要認知歷程仔細分析即會發生，Zajonc (1980) 亦認為偏好不需要推論，Kruglanski (1975) 更進一步明確指出情感或情緒形式引發的行為通常是非意識控制、非計畫、非自願的「事件」(occurrences)，而不是意識控制、計畫、自願的「行動」(actions)。換句話說，由以上文獻進行推論，可知個體在面對立場對立者時，經由反感情緒而引發的反對傾向或反應，亦可能是未經認知

仔細思考，而相當自動化的。而這樣的推論，也可以得到一些相關文獻的支持，例如有些研究指出與他人進行比較的歷程，是一種較不需認知資源的自動化運作（Gilbert, Giesler, & Morris, 1995）。換句話說，當個體在與立場對立者進行討論時，由於立場對立者會表明反對自己的立場，因此個體可能會因自動化與他進行比較、想勝過他，而同時自動化引發想要加以反對的傾向或反應（Reeder et al., 2005; Turner et al., 1987）。另外，Quinn 與 Wood（2003）亦明白指出個體產生辯護自己的態度或抗拒說服訊息的反應，可能是被內在的力量驅動的，且個體對這樣的歷程可能缺乏意識覺察。由於缺乏覺察是自動化處理的一個特徵，顯然的，個體在面對立場對立者時，經由反感情緒引發的反對傾向或反應，亦可能是屬於自動化的歷程。

在先前探討中曾經提及，一個完全的自動化處理應該有五個主要的特徵，分別為在啟動時較不需要意圖，且個體較無法覺察，啟動後也較無法控制，同時只需少量認知資源即可運作，運作的時間也較短（Ashcraft, 2002; Bless et al., 2004; Kunda, 1999; Posner & Snyder, 1975; Shiffrin & Schneider, 1977）。雖然很少有較高層次的認知處理能夠完全滿足所有自動化嚴格的標準（Bargh, 1996），但是至少可以推知，個體在面對立場對立者時，立場對立訊息對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若屬於自動化處理，那這種影響應該或多或少也具備了這些特徵，例如這種影響可能在啟動時較不需要意圖，啟動後也較無法控制，且個體較無法覺察，同時只需少量認知資源即可運作，運作的時間也較短等。

（四）小結

總而言之，這個部分的推論亦可歸納於圖 2-2-1（黑線部分所示）。由圖 2-2-1 可知，本研究認為個體在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立場對立訊息確實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應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圖中以虛線表示）。針對本部分的推論（研究問題三），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三的設計與執行進行驗證。

第三節 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 (CSAAM)

在先前兩節探討的文獻中提及，一方面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等兩類論點性質皆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影響，且這方面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另一方面當個體在與反對自己立場者進行討論時，這種立場對立訊息也會經由反感情緒中介，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並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影響，而這種影響則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然而令人好奇的是，若個體在與反對自己立場者進行討論時，即使有動機、也有能力對論點性質進行分析（會進行意識層面的處理），那麼「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影響」這種自動化處理，是否會與「論點性質的影響」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同時並存呢？另外，立場對立訊息是否會自動化干擾論點性質的處理，而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呢？這正是本研究關心的第四個問題。以下首先介紹相關文獻與推論，再整合相關文獻提出並說明本研究「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CSAAM)。

一、雙路徑模式 (dual-process model) 的基本概念

(一) 將認知運作區分為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兩條路徑

在社會心理學或社會認知許多領域的研究者，發展了許多有關認知的雙路徑模式，雖然各個模式的細節可能有所差異，但是他們對人類認知運作卻有著相似的基本假定，亦即人會在不同的思考模式中切換。有時人會進行小心、周密 (detailed) 與精緻化 (elaborate) 的處理，而有時則會進行粗略、表面的處理 (Kunda, 1999)。換句話說，人的思考可由這個角度分成兩種相對不同的處理路徑，一種是進行意識層面處理的路徑，而此時的思考屬於一種比較仔細考慮的思考 (deliberative thought)；另一種則是進行自動化處理的路徑，而此時的思考則屬於一種比較自發的思考 (spontaneous thought) (Pennington, 2000)。

在過去社會心理學或社會認知的研究中，有許多採取這種雙路徑模式來解

釋人類進行社會相關判斷的歷程。例如在先前介紹的文獻中，Gilbert (1989) 提及個體在對他人行為做歸因時，可能會歷經分類和性格描述等自動化的處理，以及修正這個需要較多認知要求的意識層面處理；Devine (1989) 也指出刻板印象及偏見之活化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而對活化的刻板印象及偏見進行壓抑，則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除此之外，在印象形成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有時我們在對他人形成印象時，可能會仔細的思考，整合相關訊息來形成一個連貫的印象(意識層面的處理)，但有時我們只是很粗略的將被知覺者歸入某個社會類別 (自動化的處理) (Kunda, 1999)。

另外，在溝通、說服相關領域的研究中，也有一些模式採用雙路徑的看法來說明態度改變所經歷的過程與影響因素，其中最著名的為 Petty 與 Cacioppo (1986, 1996) 所提出之推敲可能性模式 (ELM)。他們認為人們在接收到溝通訊息時，有可能以較深思熟慮的方式，或是以較自動化的方式來思考該訊息。當個體有動機和能力時，會傾向走中央路徑 (central route)，進行比較深思熟慮的思考，所以此時態度的改變主要決定於論點的品質；當個體沒有動機或能力時，個體則會傾向走周邊路徑 (peripheral route)，進行自動化的思考，所以此時態度的改變比較可能決定於周邊的線索，例如訊息來源是否是專家等。另外，Chaiken (1980) 也曾經進行過類似的區分，他將認知處理的路徑區分為系統式處理 (systematic processing) 與捷思式處理 (heuristic processing) 兩類，其中系統式處理類似於中央路徑，捷思式處理則類似於周邊路徑。因此，進行系統式處理時，態度改變與否比較決定於論點的審視與思考；進行捷思式處理時，態度改變與否則比較決定於一些簡單決策規則的使用，例如專家是可被信任的、大多數人的意見是正確的、或越長的論點越正確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綜上所述，可知雖然以上各模式所探討領域並不一樣 (例如社會判斷或說服)，模式中對各路徑所探討的概念也不盡相同 (例如就自動化的那條路徑而言，所界定的自動化內涵或程度亦有所差別；Chaiken & Maheswaran, 1994)，然而這些模式的共通點在於都將人的思考歷程分成兩條相對不同的處理路徑，一條路徑

是進行較意識層面的處理，而此時的思考屬於一種較仔細考慮的思考；另一條路徑則是進行較自動化的處理，而此時的思考則屬於一種較粗略的思考。而當個體走的是不同路徑時，個體的思考結果與影響思考結果的因素也可能都不相同。

（二）以往雙路徑模式較未強調兩條路徑會同時影響，以及自動化處理會對意識處理產生干擾

那麼，既然人在進行社會相關判斷或接觸說服訊息時，可能有較「意識處理」以及較「自動化處理」兩條處理的路徑，那麼人究竟何時會走意識處理的路徑，又何時會走自動化處理的路徑呢？一般而言，究竟會走哪條路徑，普遍認為有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一個是動機，一個則是能力。當個體缺乏動機，或是其他作業佔據了個體的心神時，那麼此時個體比較可能會進行自發性、較粗略的思考；然而如果當個體有思考的動機和能力時，那麼個體則比較可能會進行深思熟慮的思考（Pennington, 2000）。而這樣的論點也得到許多社會心理學家的支持，例如 Petty 與 Cacioppo（1996）在其 ELM 中，認為當個體有動機與能力時，會比較傾向走深思論點性質的中央路徑，然而當個體沒有動機或能力時，則會比較傾向走粗略，受周邊線索影響的周邊路徑。同樣的，Chaiken（1980）、Chaiken 與 Maheswaran（1994）也提及當個體有動機與能力時，會比較傾向進行系統式的處理，然而當個體沒有動機或能力時，則會比較傾向進行捷思式處理。

簡而言之，在以往的雙路徑模式中，普遍認為當個體有動機與能力時，會較傾向走意識層面處理的路徑，此時處理的結果也較不會受到自動化處理的干擾；當個體沒有動機或能力時，則會較傾向走自動化處理的路徑，而此時處理的結果也較不會受到意識處理的影響（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Wood et al., 1985）。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的說明中蘊含了以往雙路徑模式一些值得討論的隱含概念。首先，以往的雙路徑模式似乎未具體說明與強調「兩條路徑會同時影響」這樣的概念。換句話說，雖然這些模式（例如 ELM）並沒有明確反對「兩條路徑會同時產生影響」這樣的概念，但是由以上的說明可知，這些模式似乎也

較沒有強調意識處理路徑與自動化處理路徑，對社會判斷或說服效果可能產生的同時影響。另外，在這樣的說明中，也突顯了以往這些雙路徑模式，似乎較傾向認為「個體所進行意識層面的處理，並不會受到自動化處理的干擾」(Chaiken & Maheswaran, 1994)。換句話說，在這些模式的觀點中，似乎較傾向認為當個體在有動機與有能力進行意識層面的處理時，其處理的過程與結果並不會受到其他自動化處理因素的干擾。

就以上論述而言，當個體沒有動機或能力時，自然不會驅動意識層面的處理，所以進行自動化的處理時，處理過程與結果不會受意識處理的影響，自然是相當可以理解的；然而，由於自動化處理的線索或傾向通常會在進行意識處理前就開始持續存在，那麼何以當個體在有動機與能力，且進行意識層面的處理時，處理過程與結果不會受到自動化處理的干擾呢？Chaiken 與 Maheswaran (1994) 指出，過去研究主要認為可能是因為二條路徑間是互斥的，系統式的處理（意識的處理）可能會壓抑或減弱捷思式的處理（自動化的處理），因此捷思式的處理不會與系統式的處理同時並存，且對其產生干擾。而這樣的觀點也被以往許多雙路徑模式的概念所支持，例如先前所提及 Gilbert (1989) 與 Devine (1989) 等人的研究中，皆指出自動化的處理（對應偏誤與刻板印象、偏見之活化），在個體有認知資源時，可能會受到意識處理的修正或壓抑。

綜上所述，可知在以往一些探討不同主題的雙路徑模式中，似乎皆較未強調意識處理路徑與自動化處理路徑，對社會判斷或說服效果可能產生的同時影響，而且也較傾向認為意識處理可能會對自動化處理進行修正或壓抑，因此當個體在有動機與能力進行意識的處理時，自動化處理並不會對意識處理的過程及結果產生干擾。

二、 自動化處理會與意識處理同時產生影響，並對其產生干擾

雖然在以上的論述中指出，以往的雙路徑模式似乎較未強調「意識處理路

徑與自動化處理路徑，對社會判斷或說服效果可能產生的同時影響」，也較傾向認為「個體所進行意識層面的處理，並不會受到自動化處理的干擾」。那麼，人類在進行特定的認知運作時，有沒有可能兩條路徑會同時產生影響？或是有沒有可能個體所進行意識層面的處理，也會受自動化處理的干擾？

針對這樣的問題，過去有些研究者已經明確指出人類在進行特定認知運作時，兩條路徑可能會同時產生影響（Kunda, 1999; Meyers-Levy & Maheswaran, 2004），而且意識層面的處理也可能會受自動化處理的干擾。例如 Albarracín 與 Kumkale（2003）指出，個體在說服歷程中經驗的情緒反應（自動化的處理），亦可能會干擾到個體對所接觸說服訊息內容的評價（意識處理的路徑），而影響到說服效果。另外，Chaiken 與 Maheswaran（1994）對其提出的雙路徑模式也提出了一些進一步的看法。他們認為系統式與捷思式處理二者是會同時產生影響的，而且不只系統式處理會壓抑捷思式處理的運作，捷思式處理也可能會干擾系統式處理的運作，而讓處理結果有所偏誤。當然，這樣的看法也在其研究中獲得了證實。他們發現當作業對受試者來說有較高的重要性（有動機），且所呈現的論點是屬於強、弱併陳的模糊訊息（ambiguous message）時，系統式處理與捷思式處理（訊息來源可信度）會並存而同時影響到受試者的態度，且捷思式處理的影響有部分間接透過干擾到系統式處理的「價」（valence；例如對論點內容有效程度的知覺與評價）而產生。這顯示系統式處理與捷思式處理二者是可能會同時產生影響的，而且捷思式處理也可能會讓系統式處理有所偏誤。

三、 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影響會與論點性質的影響同時並存，且立場對立訊息亦會對論點品質處理產生干擾

在本章第一節的探討中曾經提及，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皆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強論點或是順論點較會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弱論點或是逆論點則較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這兩方面論點性質的影響，皆屬於意識層面

的處理。另外，在第二、三節的討論中亦曾經提及，當個體在與反對自己立場者進行討論時，立場對立訊息亦會經由反感情緒的中介，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這種「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影響」則屬於自動化的處理。那麼值得探討的是，「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影響」這種自動化的處理，是否會與「論點性質的影響」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同時並存呢？甚至立場對立訊息是否會自動化干擾論點性質的意識處理，而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呢？

（一） 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影響，會與論點性質的影響同時並存

在以上所歸納 ELM 或以往雙路徑模式（例如 Devine, 1989; Gilbert, 1989）的概念中提及，當個體有動機，亦有能力進行意識層面的處理時，自動化的處理應該會受到意識層面處理的修正或壓抑，因此應該較不會與意識層面的處理同時產生影響，也較不會對意識層面的處理產生干擾。然而在以上探討的其他新近文獻中，有許多學者則針對這樣的推論，提出了一些延伸的看法。在這些學者的看法中，開始較強調「兩條路徑會同時影響」這樣的概念。換句話說，這些學者開始強調自動化處理與意識處理兩條路徑，可能是會並存，而同時對說服或社會相關判斷產生影響的（例如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Kunda, 1999; Meyers-Levy & Maheswaran, 2004）。

雖然以上雙路徑模式討論的概念，所針對的議題與本研究所欲瞭解「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並不相同，然而由於本研究經由文獻的歸納，認為在立場對立情境中，同樣也有「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等兩條分別屬於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的路徑，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因此，倘若依據 Chaiken 與 Maheswaran (1994) Kunda (1999) 以及 Meyers-Levy 與 Maheswaran (2004) 針對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概念所提出的延伸看法，可以推論當個體在針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影響」這種自動化的處理，是可能會與「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並存，而同時產生影響的。

(二) 立場對立訊息亦會自動化干擾論點品質處理

1. 立場對立訊息會干擾論點品質的處理，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此外，Albarracín 與 Kumkale (2003) 進一步指出，個體在說服歷程中經驗的情緒反應，亦可能會影響到個體對所接觸說服訊息內容的評價。由這樣的觀點可以推論，當個體在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個體經由立場對立訊息所引發的反感情緒，亦可能會導致個體對所接觸論點的品質做出比較負向的評價。另外，Chaiken 與 Maheswaran (1994) 也認為，當所呈現的論點是屬於強、弱併陳的模糊訊息時，那麼個體的捷思式處理可能會影響到系統式處理(例如對論點內容有效程度的知覺與評價)，而使處理結果有所偏誤。由於本研究在對論點品質變項之影響進行探討時，所關心與呈現的訊息亦屬於強、弱併陳的模糊訊息，因此由以上的觀點亦可推論，個體在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立場對立訊息所引發的反感情緒，確實可能會導致個體對所接觸論點的品質，產生比較負向的知覺與評價，而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也就是說，本研究認為當個體在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立場對立訊息亦可能會經由反感情緒的中介，而對個體論點品質的處理產生干擾。因此此時個體將在立場對立訊息的干擾下，傾向將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知覺的較沒有道理，而間接對其表現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註：本研究認為由於強論點屬於較有品質的論點，會被知覺為較沒有品質的空間較大，然而弱論點原本就屬於較沒有品質的論點，會被知覺為更沒有品質的空間不大，因此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應較會表現於強論點的判斷上，而較不會表現在弱論點上。換句話說，本研究認為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主要應會表現在減低個體對強論點品質的知覺上，此部分推論參見實驗四假設處所述。)

2. 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亦屬自動化歷程

此外，在第二節探討的文獻中曾經提及，立場對立訊息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應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那麼在以上的說明與推論中，另一個值得

補充說明的問題是，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是否亦屬於一種自動化的處理呢？

針對這個問題，由於在第二節歸納的文獻中曾經提及，由情緒引發與驅動的傾向或反應，可能是未經認知仔細思考，而相當自動化的。例如 LeDoux(1996)指出情緒反應有可能並不需要認知歷程仔細分析即會發生，Zajonc(1980)亦認為偏好不需要推論。Kruglanski(1975)更進一步明確指出情感或情緒形式引發的行為通常是非意識控制、非計畫、非自願的「事件」(occurrences)，而不是意識控制、計畫、自願的「行動」(actions)。而由於在本研究的推論中，認為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主要亦是經由反感情緒的中介，因此由這個角度亦可以推論，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亦可能是未經認知仔細思考，而相當自動化的。換句話說，依據先前所歸納有關自動化處理的特徵(Ashcraft, 2002; Bless et al., 2004; Kunda, 1999; Posner & Snyder, 1975; Shiffrin & Schneider, 1977)，這種干擾應該在啟動時較不需要意圖，啟動後也較無法控制，且個體較無法覺察，同時只需少量認知資源即可運作，運作的時間也較短等。

總而言之，本部分認為當個體在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會同時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影響；另外，立場對立訊息亦會干擾論點品質的處理，而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本部分認為論點性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則皆屬於自動化的處理。

四、「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的提出與說明

(一) 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

綜合以上各節所探討的文獻與推論，本研究提出「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arguments agreement/disagreement model of counterpositional situation; CSAAM)，來說明「立場對立情境中，個體在對另一方提出的論點做贊否判斷

時，存在的傾向、影響因素與認知歷程」等相關問題，模式如圖 2-3-1 所示。

由圖 2-3-1 可知，CSAAM 認為當個體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共有兩條路徑的因素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1. 意識層面的處理路徑：論點性質的影響

第一條路徑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路徑，指的是論點性質的影響（以實線表示）換句話說，個體會對立場對立者所提出的論點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有部分要視立場對立者提出什麼性質的論點而定。由圖中可知，在這條路徑中，包含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等兩種論點性質，皆會直接影響到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其中順論點或是強論點皆會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而使個體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線段尾端以箭頭表示），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線段尾端以圓形表示）；然而逆論點或是弱論點則皆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使個體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

2. 自動化層面的處理路徑：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第二條路徑則是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路徑，指的是傳送者立場訊息的影響（以虛線表示）。由圖中可知，倘若與個體進行意見討論者是一個立場對立者時，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可能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在直接的影響方面，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可能會透過反感情緒的中介，引發個體對傳送者的反對傾向，而導致個體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另外，在間接的影響方面，這種立場對立訊息亦可能會透過反感情緒的中介，而干擾到個體對論點品質的處理，使個體傾向把所接收到的論點知覺得較沒有品質，而間接影響到其表現出來的論點贊否反應。

最後，整體而言，CSAAM 是屬於平行路徑取向的模式。模式中認為論點性質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則皆屬於自動化的處理，而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兩條路徑則會同時產生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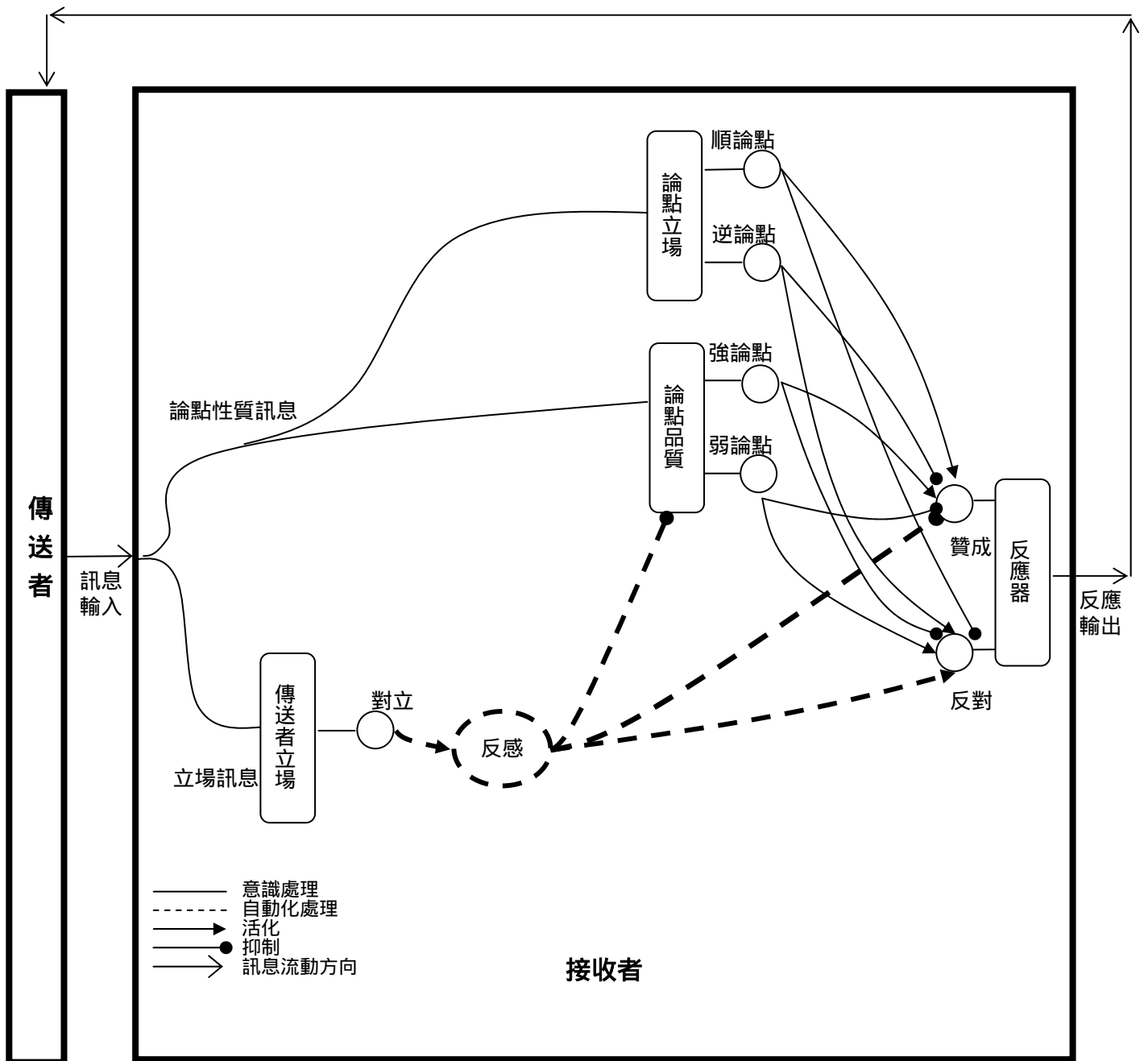


圖 2-3-1 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模式

(二) 值得進一步說明的問題：立場對立者會提出支持另一方立場的論點嗎？

在以上 CSAAM 所說明意識處理的路徑中指出，論點立場會是影響接收者論點贊否反應的一類因素。在這樣的概念中，有一個關於模式「能否套用至日常生活真實意見討論情境」，且值得進一步說明的問題是：立場對立者在針對該議

題進行討論時，是否可能提出支持另一方立場的論點呢（由接收者的角度來看，本研究稱之為順論點）？

針對這個問題，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認為這是有可能的。誠如本章第一節文獻整理處所述，我們在說服他人支持特定的立場時，有可能會使用正反並陳的雙邊訊息(Aronson et al., 1994; Gass & Seiter, 1999; O’Keefe, 2003; Perloff, 2003; Simons, et al., 2001; 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甚至在一些研究中，更發現當接收者反對傳送者的立場時，傳送者若使用正反並陳的雙邊訊息，將會有更強的說服力（例如 Hovland et al., 1949）。換句話說，即使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在進行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時，仍然可能會針對支持雙方立場的論點進行客觀分析，並透過呈現雙邊訊息的方式，來對立場對立的接收者進行說服。因此，在 CSAAM 中納入論點立場這個變項，應不致於讓模式中陳述的概念，與日常生活的真實意見討論情境脫節。然而，為避免立場對立者呈現出支持另一方立場的論點時（即順論點），可能因超出受試者的預期（懷疑立場對立者怎麼會提出這種性質的論點），而對反應時間的測量產生干擾，因此在呈現立場對立者的論點供受試者判斷前，研究者皆會明確告知受試者「立場對立者針對此議題做了正反兩面分析，而所將呈現給受試者判斷的，是立場對立者所分析的兩方面理由」。

五、 本節小結

總而言之，本研究建構出 CSAAM 來說明「立場對立情境中，個體在對另一方提出的論點做贊否判斷時，存在的傾向、影響因素與認知歷程」。在 CSAAM 中，主要採取平行路徑取向的觀點，一方面認為「論點性質對贊否反應的影響」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會與「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影響」這種自動化的處理同時並存，且立場對立訊息也會自動化對論點品質的處理產生干擾，而間接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針對此部分之推論（研究問題四），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四的設計與執行進行驗證。

第四節 CSAAM 整體驗證之相關文獻

在第三節的文獻探討中，本研究經相關文獻的歸納提出 CSAAM，其中認為論點性質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而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除了會同時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影響之外，立場對立訊息亦會干擾論點品質的處理而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而本研究預計透過實驗四的設計與執行，來初步驗證 CSAAM 概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設計來建構與初步驗證 CSAAM 概念的實驗中，實驗四雖然能夠驗證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同時影響，但似乎沒有辦法驗證論點性質的影響確實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確實是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另外，雖然在實驗一、四中，有部分的證據支持論點性質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在實驗三中，亦有證據明確支持立場對立訊息對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確實屬於自動化的處理。然而一方面由於這兩個實驗對意識處理或自動化處理提供的證據，都是只有針對模式特定部分影響路徑考驗所得的結果，而非同時納入模式各影響路徑，來進行整體驗證；另一方面實驗三亦未針對「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進行自動化的驗證。因此，令人好奇的是，論點性質的影響是否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是否確實屬於自動化處理？這兩條影響路徑是否會因監控提醒而被修正或促進？這兩條影響路徑是否會因分心作業而受干擾或加強？這兩條影響路徑是否會因時間壓力而受干擾或加強？這正是本研究所關心的第五個問題，而這些問題可由以下相關文獻與說明導出待驗證的一些推論。

一、 監控提醒之影響

(一) 監控提醒能修正論點立場之影響，並促進論點品質之影響

首先，倘若如本研究所言，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那麼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思考各論點有無道理」時，這兩方面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是否會因監控提醒而被修正或促進呢？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需先回到先前對自動化處理與意識處理所界定的特徵。在第二節的文獻探討中指出，自動化的處理相對於意識層面處理而言，通常會包括一些特徵，例如啟動時較不需要意圖，且個體較無法覺察，啟動後也較無法控制，同時只需少量認知資源即可運作，運作的時間也較短等 (Ashcraft, 2002; Bless et al., 2004; Kunda, 1999; Posner & Snyder, 1975; Shiffrin & Schneider, 1977)。換句話說，倘若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那麼這兩種論點性質的影響應該會是個體較能夠覺察，也較能夠控制的。因此，若真如本研究所推論，這兩種影響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那麼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思考各論點有無道理」時，一方面應該能夠使個體在意識的監控之下，修正論點立場的影響，減弱順論點的贊成傾向與逆論點的反對傾向；另一方面個體亦應能在意識的監控之下，促進論點品質的影響，而加強強論點的贊成傾向與弱論點的反對傾向。

(二) 監控提醒無法修正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

另外，倘若如本研究所言，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歷程，那麼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思考各論點有無道理」時，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否會被修正呢？

針對這個問題，雖然有一些研究顯示，個體一些自動化處理產生的結果或影響，是可能會被意識處理所修正或壓抑的。例如 Devine (1989) 的研究中指出，當個體有足夠的認知資源時，意識層面的處理可能會對刻板印象及偏見活化等自動化處理的結果進行壓抑，而不讓它顯露出來。Gilbert、Pelham 與 Krull (1988) 的研究中也發現，當個體在對他人的行為進行歸因解釋時，如果有較高的認知負荷，那麼此時的對應偏誤的傾向就變大了。顯然的，在較低認知負荷的情況中，對應偏誤的傾向有部分可能被較需要認知資源的意識處理給修正了。然而，何以在較低認知負荷的情況中，會比在較高的認知負荷情況中，更不容易產生對應偏誤的傾向呢？在過去的解釋，主要認為是因高認知負荷情況中，受試者比較沒有認知資源進行仔細思考，因此無法注意到情境因素的影響，並對偏誤的傾向進行修正 (Pennington, 2000)。但是，在這樣的解釋中，蘊含了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當個體比較沒有認知資源時，似乎是因為較無法覺察到自己的對應偏誤傾向，因此也較無法將自己的注意焦點由「被知覺者本身」轉換到「情境因素」上，以進行修正。換句話說，若個體較無法覺察到自己已經產生偏誤的傾向時，似乎將更無法對自動化處理的結果或影響進行修正 (Wegener & Petty, 1997)。

這樣的觀點也獲得了許多論述或研究的支持。例如 Johnson 與 Raye (1981) 指出人對自己知覺推論的歷程經常沒辦法覺察，因此在 Gilbert、Pelham 與 Krull (1988) 的研究結果中，或許正因為受試者對自己對應偏誤的傾向還是缺乏足夠的覺察，因此即使在較低認知負荷的情況中 (有足夠的認知資源)，受試者還是會產生對應偏誤的傾向，而無法充分的修正。另外，Albarracín 與 Kumkale (2003) 在他們提出的模式中，也指出個體在說服歷程中經驗的情緒反應 (自動化處理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到個體對所接觸說服訊息內容的評價 (意識處理的路徑)，而影響到說服效果，然而倘若當個體覺察到情緒反應是不相關的訊息時 (覺察到偏誤傾向)，個體就不會再依據情緒反應進行判斷。甚至 Wegener 與 Petty (1997) 更明確指出個體若要修正自己的判斷，前提是必須覺察到自己的判斷已經被污染

了、知道偏誤的方向，並且有足夠的認知資源。顯然的，個體有沒有覺察到自己的反應受到不相關自動化因素的影響而導致偏誤，是個體能不能對自動化處理進行修正或壓抑的關鍵因素，若個體對自己一些自動化處理產生的結果或影響（偏誤傾向）缺乏充分的覺察時，即使有認知資源，意識處理可能還是無法對其進行充分的修正或壓抑。

那麼回到剛剛那個問題，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思考各論點有無道理」時，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否會被修正呢？針對這個問題，倘若如本研究先前所推論，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確實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那麼由之前所界定的自動化處理特徵來看，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應該會是個體較無法覺察的（這樣的推論亦在實驗四的結果中，獲得了支持，受試者似乎較無法覺察自己的判斷會受到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換言之，即使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思考各論點有無道理」時，由於個體對立場對立訊息的自動化偏誤影響，並無充分的覺察，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亦無法經由意識的監控，而對其進行充分的修正，此時立場對立訊息一方面仍會經由反感情緒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亦會對論點品質的處理產生干擾，而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三）小結

總結以上文獻與推論，可知個體在立場對立情境中對另一方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由於本研究認為論點性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因此個體在進行論點贊否判斷時，倘若提醒其「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思考各論點有無道理」，這種監控提醒應能修正論點立場之影響，並促進論點品質之處理。然而，由於個體對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並無充分覺察，所以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並無法被監控提醒所修正。針對本部分推論（研究問題五之一），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五的設計與執行進行驗證。

二、 分心作業之影響

(一) 論點性質之影響會被分心作業所干擾而變小，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不會受到干擾而可能加大

另外，倘若如本研究所言，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歷程，那麼當個體在對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若同時進行其他的分心作業，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或是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是否會因分心作業而受干擾或加強呢？

針對這個問題，過去有許多研究都採取分心作業取向的方法，來驗證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是否分別存在。這種驗證取向的邏輯，正如同本研究先前整理自動化與意識處理的特徵處所述，主要是認為自動化處理只需要少量認知資源即可運作，因此其運作較不會受到其他同時進行作業（分心作業）的干擾，然而意識的處理則需要較大量的認知資源，所以在進行意識處理時，倘若同時進行分心作業，便會產生認知過度負荷的現象，而對意識處理產生干擾。簡言之，如果一歷程屬於自動化的處理，那麼該處理應較不受分心作業的干擾，然而如果一歷程屬於意識的處理，那麼該處理則易受分心作業的干擾。

在這一類研究中，許多研究都發現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是分別存在的歷程，而且分心作業可能導致自動化處理的結果或影響變的更加明顯。例如在先前所提及的文獻中，Devine (1989) 發現當透過分心作業干擾壓抑刻板印象與偏見的意識處理時，受試者刻板印象與偏見的自動化想法或情感反應即浮現了。Gilbert、Pelham 與 Krull (1988) 亦採用這類驗證方法，發現對應偏誤的產生是一種自動化處理的結果，而修正則是一種意識處理的結果。因此當受試者因分心作業而導致高認知負荷時，意識處理較沒辦法進行修正的處理，所以對應偏誤的傾向就變強了。Gilbert 等人 (1995) 亦用此類分心作業發現，人與他人進行結果

比較的傾向是自動化的處理，而且只在個體有認知資源情況下，個體才能進一步考慮到人我之間產生差異的情境因素。另外，Tobin 與 Weary (2003) 也發現，有、無認知負荷的受試者在觀察個體空間能力作業的表現時，雖然在觀察過程一開始與中期的當下即時評定中，都顯示受試者會將個體的表現與先前建立的參照標準進行自動化的比較(在觀察前，會先給受試者看其他人成功或不成功表現的錄影帶)，而對個體的「行為表現作出歸類(評定成功程度)」、「智力特質作出推論(評定聰明程度)」，但是「無認知負荷」的受試者在觀察最後階段的即時評定，以及最終的評定結果上，都較能考慮情境因素作出修正，然而「有認知負荷」的受試者則從頭到尾會存在自動化比較的傾向，不能做出修正。顯然的，認知負荷影響了個體修正的能力，而使自動化處理的結果較明顯的顯現了出來。類似這樣的結果，Gilbert(1989)已透過許多不同操弄認知負荷的分心作業加以重複驗證，例如要求受試者同時記住一長串的數字或字彙、監控或回應閃現在螢幕上的字彙、要求他們試著逗他人笑等等。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分心作業可能會對意識處理的歷程產生干擾，而讓自動化處理的結果或影響變的更加明顯。因此回到上述的問題，倘若如本研究所推論的，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歷程，那麼當個體在對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若同時必需進行其他的分心作業，依據上述的文獻可以推論，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將可能因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而減低。換句話說，順論點與強論點引發的贊成傾向，以及逆論點與弱論點引發的反對傾向皆可能因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而減低；另一方面，立場對立訊息的自動化偏誤影響，則可能因不會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而加強，此時，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以及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效果，應皆會有加大的趨勢。

(二) 與說服領域分散注意 (distraction) 研究關連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分心作業是否會干擾或加強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之影響這個問題，似乎亦可由過去說服領域中，有關分散注意對於說服效果影響的研究中，找到一些否定或是支持的證據。事實上，在過去分散注意的研究中，存在著「認知反應觀點」(cognitive response explanations) 與「訊息處理觀點」(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planations) 兩種不同的結果預測與解釋方向(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

1. 認知反應觀點 (cognitive response explanations)

在「認知反應觀點」中，認為任何能夠使個體更難對立場差距溝通進行反駁的事情，都可以減低個體抗拒說服的能力，讓說服訊息順利達到目的(Reardon, 1991; 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 Taylor et al., 1997)。Festinger 與 Maccoby (1964) 的研究即證實了分散注意對說服的效果，一些支持大學兄弟會的人，倘若在聆聽反對兄弟會的言論時，看的是諷刺現代藝術的影片(與該言論無關的影片)，會比看的是反對兄弟會的人正在發表演說的影片，更容易產生說服效果。顯然的，看無關的影片容易分散受試者的注意，降低受試者抗拒說服的能力，進而產生說服的效果。雖然 Festinger 與 Maccoby (1964) 並未對此歷程進行直接的檢驗(Knowles & Linn, 2003a)，然而 Petty 與 Brock (1981) 整理了 1964 年以來 22 篇有關分散注意的說服研究，其中以不同受試者及分散注意方法進行研究，結果絕大部分的研究(20 篇)都發現在分散注意的情況下，會減少個體的反駁能力、增加說服的效果。而其效果正可由認知反應角度加以解釋，亦即其效果可能來自於分散注意干擾到反駁的過程(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所以當溝通訊息和自己態度立場差距很大，而且我們對於該訊息又有較高的涉入時，可能因為可以激起最激烈的反駁，所以在這種情況中，分散注意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Petty & Brock, 1981)。

2. 訊息處理觀點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planations)

另外,「訊息處理觀點」所持的是相反的看法。在這個觀點的解釋中,認為分散注意會干擾接收者對於所接收論點或證據的理解,因而導致說服的效果變差 (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事實上,也有研究或論點支持這樣的看法,例如在先前所提及的雙路徑模式中,指出當個體較缺乏能力時(因分心作業而缺乏認知資源),個體可能會較傾向走自動化處理的路徑(例如 Chaiken, 1980; Petty & Cacioppo, 1996),因此個體較不會對論點作審慎分析,反而易受一些周邊線索影響。另外,Haaland 與 Venkatesan (1968)、Vohs 與 Garrett (1968)之研究亦發現分心刺激會降低受試者對於所接收訊息的回憶量,以及對這些訊息的接收程度,甚至在 Buller (1986)進行的後設分析中,雖然發現認知反應觀點與訊息處理觀點皆獲得一些支持,但對訊息處理觀點的支持卻是較強的,分心刺激和態度改變間呈現著負向的關係。

3. 本研究推論與認知反應觀點較為不同,與訊息處理觀點較為一致

雖然以上兩種觀點,探討的是分散注意對說服效果的影響,且兩方面觀點皆獲得相關文獻支持,但若由其描述的機制,可推論在探討分心作業是否會干擾或加強「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對贊否反應之影響」這個問題時,認知反應觀點與本研究推論較為不同,然而訊息處理觀點所預測的結果與描述的機制則和本研究的看法較為一致。

首先,在認知反應觀點方面,主要認為分散注意會干擾個體對論點的反駁(而非理解),因此會導致個體更傾向接受說服訊息(即使是立場不一致訊息)。換句話說,若由這種觀點進行推論,可知當個體在對所接觸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若同時進行分心作業,應會因個體反駁能力降低,而導致其對論點的贊成傾向增加(不管傳送者是否是立場對立者,或是論點的性質為何,普遍顯示出分心作業提升贊成傾向的主要效果)。而這樣的觀點顯然和本研究的推論不相同,在本研究的觀點中,認為在同時進行分心作業時,論點性質之影響應會被分心作業所干擾而變小,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不會受到干擾而可能加大。

另外，在訊息處理觀點方面，認為分散注意會干擾接收者對於所接收論點或證據的理解，而導致個體反而較不容易受論點的影響，而較容易受周邊訊息的影響。換句話說，若由這種觀點進行推論，可知當個體在對所接觸論點進行贊成或反對的判斷時，若同時進行分心作業，一方面因為分心作業會干擾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因此應會導致論點性質對個體贊否反應的影響降低，而使順論點與強論點引發的贊成傾向，以及逆論點與弱論點引發的反對傾向皆減低。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分心作業會干擾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所以應會導致個體對較有道理或是與個體自身立場一致的論點，做出贊成判斷的傾向降低，而對較沒有道理或是與個體自身立場不一致的論點，做出反對判斷的傾向降低。另一方面，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可能因不會受到分心作業干擾而會變得更加明顯，此時，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以及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效果，應皆會有加強的趨勢。而這樣的觀點顯然和本研究的推論與解釋不謀而合。

(三) 小結

總結以上文獻與推論，可知個體在立場對立情境中對另一方的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由於本研究認為論點性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因此倘若個體在對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若同時必需進行其他的分心作業，那麼因為分心作業會干擾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所以論點性質之影響應會被分心作業所干擾而變小，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不會受到干擾而可能加大。針對本部分的推論（研究問題五之二），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六的設計與執行進行驗證。

三、 時間壓力之影響

(一) 論點性質之影響會被時間壓力所干擾而變小，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不會受到干擾而可能加大

最後，倘若如本研究所言，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確

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歷程，那麼當個體在對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若存在著必須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或是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是否會因時間壓力而受干擾或加強呢？

雖然較少有研究採取時間壓力的方法，來驗證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是否分別存在。然而，採用時間壓力來對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進行驗證的邏輯，和分心作業是相當類似的。換句話說，在先前歸納有關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特徵中，提及自動化處理在運作時通常只需花少量的時間，而意識處理則通常必須花比較多的時間（Ashcraft, 2002; Kunda, 1999）。因此，倘若在進行特定作業時有時間的限制或是壓力，那麼這種時間限制或是壓力應較不會對自動化處理產生影響，然而卻可能較會對意識的處理產生干擾。換句話說，當個體在進行特定作業時，時間限制或壓力可能會導致個體意識方面的處理受到干擾，但是自動化處理的結果或影響卻比較不會受到影響，而可能變的更加明顯。

這樣的觀點，似乎也可以由一些文獻得到支持。例如在先前所提及的雙路徑模式中，指出當個體較缺乏能力時，可能會較傾向走自動化的路徑，因此個體較不會對論點作審慎分析，而容易受一些周邊線索影響（例如 Chaiken, 1980; Petty & Cacioppo, 1996），而當個體在進行特定作業時，若缺乏充裕時間來進行理解、判斷，應該亦可視為缺乏能力的一種狀況。Ratneshwar 與 Chaiken（1991）的研究中即發現，當個體沒有足夠時間來進行訊息的理解時，那麼此時個體將會比較容易受來源者這種較周邊線索的影響。而 Chaiken 與 Maheswaran（1994）更明確指出，當個體若缺乏時間做足夠的訊息處理時，個體比較可能會進行捷思式這種自動化的處理，而比較不會進行系統式這種較需要認知資源的意識處理。

簡言之，時間壓力可能會對意識方面的處理產生干擾，但是自動化的處理結果或影響卻比較不會受到影響，而且可能在時間壓力的干擾下變的更加明顯。因此回到上述的問題，倘若如本研究所推論的，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歷

程，那麼當個體在對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若存在著必須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依據上述的文獻可以推論，時間壓力可能會干擾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而使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減低。換句話說，順論點與強論點引發的贊成傾向，以及逆論點與弱論點引發的反對傾向皆可能因受到時間壓力的干擾而減低；另一方面，立場對立訊息的自動化影響，則可能因不會受到時間壓力的干擾而加強，此時，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以及對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效果，應皆會有加大的趨勢。

（二） 小結

總結以上文獻與推論，可知個體在立場對立情境中對另一方的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由於本研究認為論點性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因此倘若個體在對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若存在著必須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那麼因為時間壓力會干擾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所以論點性質之影響應會被時間壓力所干擾而變小，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不會受到干擾而可能加大。針對本部分的推論（研究問題五之三），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七的設計與執行進行驗證。

四、 本節小結

綜合本節所述，可知本研究 CSAAM 認為論點性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因此一方面在對個體進行監控提醒後，個體應能修正論點立場之影響，並促進論點品質之影響，然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不會因為監控提醒有任何改變。另一方面，當個體在進行論點判斷時，若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或存在著必需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那麼因為個體對論點的理解會受到干擾，所以論點性質之影響應該會變小，然而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則不會受到干擾，而可能加強。針對本部分的推論（研究問題五），本研究主要透過實驗五、六、七的設計與執行來進行整體驗證。